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期／民國 95 年 12 月／頁 97～130

拉克勞（Ernesto Laclau）霸權理論中的敵對與異質性*

林淑芬**

摘　要

本文試圖指出，正是由於拉克勞與慕芙堅持建立霸權的必要性，所以即便兩位作者一再強調霸權終極不完滿的特性，其對於「離散」（dispersion）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理解，仍無可避免地從結構角度出發，並視之爲結構的匱乏或不足。本文試圖檢視拉克勞從《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出版之後一系列的理論深化與修正，說明不論是早期詮釋的「離散中的規律」或是晚近的「異質性」都是基於某個特定的政治存有論的立場上出發加以理解的。本文認爲，拉克勞的立場，雖然經歷了幾次修正，但並未如某些論者所言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基本上仍是相當連貫的。而其連貫性便是建立在對於離散與異質性的特定理解上，並持續對於霸權理論延伸出來的政治想像產生了極爲根本的影響。

關鍵詞：敵對、霸權、錯位、異質性

---

* 本文初稿以「敵對與異質性」爲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05 年 12 月 6-8 日舉辦之「現代性的政治反思」國際研討會。感謝朱元鴻、劉紀蕙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所提出的寶貴建議與修改意見。本文爲國科會計畫《超越性，內在性與基進民主》（NSC 94-2414-H-031-005-）部分研究成果。

** 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e-mail: fen@scu.edu.tw。

收稿日期：95 年 1 月 5 日；通過日期：95 年 7 月 1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慕芙（Chantal Mouffe）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後簡稱《霸權》），主要針對的是左派在理論以及實踐上所面臨的一連串的困境。他們指出這些困境包括：後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結構轉化所導致的持續錯位與工人階級的衰退、極權化社會主義國家接二連三爆發的危機、益趨官僚化的福利國家所面臨的來自新社會運動與新保守主義的嚴峻挑戰，以及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出現的迥異於階級鬥爭的群眾動員型態等等。針對這些盤根錯節的問題，拉克勞與慕芙系譜式地審視了第二國際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指出其對於「歷史必然性」與工人階級在存有層次上的優先地位的預設，無法適切地回應當代社會持續分化的多元性，也根本地壓縮了政治空間。兩位作者直言，傳統左派由於未能適切地理解不同的壓迫與不平等各自具有不可化約的特殊性，以致無法將民主落實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他們試圖藉由重新詮釋十八世紀民主革命所揭示的平等原則，並挑戰「（完滿／客觀）社會」的預設，[1] 爲左派開闢出一個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空間。而此一可能性空間的具體提案，便是他們在《霸權》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基進多元民主」。

拉克勞與慕芙所提倡的基進多元民主之要義，首在放棄傳統左派以階級壓迫爲核心訴求，並以階級鬥爭爲社會改革之先驗形式的理論立場。基進多元民主寄望在多元、自由、平等的基礎上，接合（articulate）[2] 對抗

---

[1] 拉克勞與慕芙的基本立論是，在現代性的脈絡中，由於統籌社會差異的最終原則與客觀性（objectivity）並不存在，社會無法成爲一個完全封閉的整體，此即其「社會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的觀點。他們認爲不論社會形構與認同或者意義，皆無法以任何超驗性或化約性的範疇，例如主體或者經濟生產關係，作爲其源頭或終極目的（1985：97-122）。因此，社會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是一個「多重決定」的空間，但此處的多重決定，既非個別不同的決定因素的集結，亦非阿圖塞（Althusser）所提出的「最後決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多重決定意味的是與所有的教條本質主義決裂，解構僵固的認同，並肯認認同本身的開放、偶然與不完整的特性（1985：104）。解構社會作爲一個整體，並且指出認同的偶然本質與潛在開放性，對於《霸權》一書而言，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理論起點。

[2] 此處的「接合」（articulation）指的是將原先沒有內在關連或共通性的事物與政治訴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式各樣壓迫的多重鬥爭。拉克勞與慕芙認爲，當前的左派必須秉持著非本質主義的立場，藉由在不同的訴求之間建立「等同」（equivalence）關係，[3] 使原先不同的訴求暫時懸置個別差異，並且隨著彼此間等同關係的持續擴張，形成比較全面的社會共識，也就是他們所稱的霸權（hegemony）。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惟有放棄以某個特定的訴求作爲超驗的、普遍的訴求，並且不再指定某個特殊階級體現普遍階級（universal class）時，左派聯合鬥爭的本質才具有民主的內涵；同時，透過等同關係的建立，不同的權利訴求也才不至於淪爲個人主義式的主張。易言之，拉克勞與慕芙在堅持左派應該清楚認知並思考如何面對社會多元差異存在的同時，仍不忘呼籲左派不可因爲強調差異而放棄建立一個可以對抗各式各樣壓迫關係的全面性另類方案。[4] 這個立場在拉克勞討論左派應該如何因應當前新自由主義霸權時，表達地十分清楚：

> 如果不能在過去幾十年擴增的特殊主義的基礎上（而非與之對立），建立一個廣泛的普遍論述，左派將沒有未來。普遍性的面向雖然已經在組織特定訴求以及議題取向政治的論述中運作著，但是那是一個隱而不彰且未充分發展的普遍性，尚未有能力讓自己成爲足以激起廣大民眾想像的一套象徵〔體系〕。眼前的任務乃是擴張普遍性的種子；讓我們擁有一個完整的社會想像，以對抗過去三十年來作爲世界政治霸權視域的新自由主義共識（2000：306）。

透過建立可以共同指涉的外部對象而產生共通性，結合成一個「等同鏈」（chain of equivalence）。

[3] 此處所言的「等同」（equivalence），簡要地說指的是在多元的社會訴求間，建立共同的敵人或對手，而暫時懸置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成就等同關係。此一等同關係的建立，凸顯了不同的社會訴求之間，彼此並無內在的關連，然而，透過接合實踐，建立共同敵人的機制。關於等同邏輯的相關討論，參見林淑芬（2003a）。

[4] 這個堅持，說明了拉克勞與慕芙的基進多元民主與某些強調差異的後現代政治顯著不同。學者 Fred Dallmayr 便曾指出，受到後結構主義或者解構影響的政治理論，常常遭受「逃避現實」（escapism）或擅長使用模稜兩可的辭藻，而無視於具體脈絡與權力關係等指控。Dallmayr 認爲拉克勞與慕芙在《霸權》一書中所展現的理論與政治立場，則是在充分地深化解構以及「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的政治隱涉的同時，避免了逃避現實與「天真的無政府主義」的問題（Dallmayr, 2004: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在不遺餘力地主張建立全面民主方案之必要的同時，拉克勞與慕芙也清楚地意識到那是一個困難重重的任務。他們指出（1985：188）：「民主的體驗應該包含承認社會邏輯的多樣性與其接合的必要性。但是此一接合應該不斷地被重新創造與協商，而達成絕對平衡的終點並不存在」。基本上，他們兩人呼應了 Claude Lefort 對現代性以及托克維爾所稱之「民主革命」的詮釋，亦即，隨著「確定性的標誌」的消失，權力所在之處成爲僅能被暫時佔領的「空場」（empty place），無可撼搖的法律與正當性基礎已蕩然無存，而足以完整再現／代表社會的中心亦付之闕如。在這樣的現代性處境中，民主意味的是制度化「對於無可理解與掌握的社會的體驗」（Lefort, 1986: 303）。此一體驗的重點，不是參與一套套的制度規則或形式程序，而是對於終極完滿民主的「不可能性」的體驗。[5] 然而重要的是，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此一終極不完滿的體驗，非但不應傷害我們追求民主的信念，反倒應該將之視爲民主政治實踐的可能性條件。一方面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均衡，讓不同訴求之間的差異得以完全消失的絕對等同關係本就不存在。亦即，在接合不同訴求、建立霸權的過程中，平等與特殊性、多樣性之間持存的張力或可因爲認同透過等同關係建立起來的普遍性而稍減，但卻無法一勞永逸地化解。另一方面，若一味地側重等同關係，而將社會切割成二元對立的敵我空間，甚至寄望透過等同關係的無限擴張全然壓抑差異，進而塑造一個完全單調齊一的社會空間，亦無所謂的多元民主可言（1985：183-84）。換言之，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多元與平等之間的張力不但事實上不可能消失，且就其基進民主立場而言，亦

[5] 此一「終極不可能性」意味的是提出最終保障或者一個確切的正當性基礎的不可能。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此一不可能性則將進一步延伸成爲他們所稱之「社會的不可能性」的觀點。一位審查者提出 Lefort 所言的是民主的爭議，抗爭與「不確定性」，而非「終極不可能性」。不過，不確定性的前提是「終極完滿的不可能性」，因爲「如果」所謂的完滿意味的是「空場」（empty place）被填補，「那麼」，一切法律，秩序，知識，權力都將確定下來，便無所謂不確定性與爭議了。事實上，民主的動態不確定性，的確不見得要與終極不完滿連結在一起。一如審查者所知，尚有其他以「豐盈」爲準的基進民主立場。不過筆者在此使用終極不完滿的特性，除了因爲慕芙亦對 Lefort 作此詮釋（Mouffe, 2000: 1-2）外，事實上，我們的解讀亦可以透過 Lefort 受到拉崗精神分析的影響，而使用 the Real, Symbolic 等概念得到「支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應該消失。

即便我們接受多元與平等之間的張力不會消失，且民主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我們仍可提出以下幾個問題：[6] 何以在當前多元差異的社會情境中，民主鬥爭仍須強調聯合鬥爭的形式？個個擊破式的鬥爭是否不可能，或者完全不足取？就算我們接受聯合鬥爭之必要，那麼，聯合鬥爭的可能性條件爲何？聯合鬥爭是否只能採取拉克勞與慕芙提出的霸權邏輯，亦即，聯合鬥爭是否必得透過建立並擴張等同關係始能達成？在霸權建立的過程中，是否需要一個可以接合不同訴求，並成爲共通性的代表？這個整體的代表與其它的訴求之間的關係爲何？尤有甚者，在建立霸權的過程中，原本被暫時懸置的個別訴求之間的「差異性」，如果沒有完全消失，將發揮何種作用？是否會因爲對於建立霸權或全面性民主方案之必要的堅持，最終仍然不免產生爲了聯合鬥爭的需要而犧牲了多元自主與異質性的空間？拉克勞與慕芙的基進民主，究竟如何面對差異？[7]

筆者認爲在回應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先針對拉克勞霸權理論進行比較細緻的概念釐清的工作。因此，本文的重點不在於直接回應上述的問題，而是將焦點放在闡述霸權理論中的「敵對」（antagonism）、「離散」（dispersion）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等概念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梳理拉克勞[8] 的霸權理論邏輯，並提供我們思考上述問題的起點。以「敵對」作爲討論核心似乎順理成章，但是選擇「離散」與「異質性」，乍看之下則顯得有些突兀。的確，《霸權》以及拉克勞之後陸續出版的著作中，

---

6 事實上，《霸權》出版之後，引發了相當熱烈的迴響，其中當然也不乏批評的聲音。這些批評除了來自於傳統左派陣營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對於霸權與民主之間關係的質疑。不少論者認爲，拉克勞與慕芙的霸權理論強調了政治中不可化約的無可決斷性與不確定性，但是此一觀點無法順理成章地導引出基進民主的立場，他們認爲兩者之間需要藉由某種倫理立場來銜接（Critchley, 2004；Norval, 2004）。

7 當然，拉克勞與慕芙的基進民主，不是唯一處理民主共識建立過程中多元與平等之間張力的理論，慕芙所稱的「理性共識模型」的代表，哈伯瑪斯（J. Habermas）與羅爾斯（John Rawls），便各自以其方式回應了這個問題（Mouffe, 1993; 2000）。本文在此不擬比較拉克勞與慕芙的基進民主與其他民主立場的異同，進而區辨優劣。

8 本文將只針對拉克勞的書寫進行討論。事實上在《霸權》出版之後，慕芙的書寫主要集中在與其他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對話。本文中關於霸權理論的重要概念的發展，咸以拉克勞的書寫爲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接討論「離散」的篇幅著實不多。然而，本文試圖說明，幾個與霸權形構息息相關的核心概念，例如，「界限」、「接合」、「等同／差異邏輯」，乃至於「錯位」（dislocation）等等，都是建立在對於「離散」的特定理解之上，而這也影響了霸權理論面對差異（difference）的特定方式。另一方面，在拉克勞晚近出版的《論民粹理性》中（Laclau, 2005），我們看到了他對於「異質性」的探討。事實上，已有論者指出，在提出了異質性概念之後，拉克勞的霸權理論產生了相當根本的轉變：不論是就形式理論或就深受此一理論啓發的經驗研究而言，都應從過去對於敵對、等同關係的重視，轉而強調異質性（Thomassen, 2005）。然而，筆者對此抱持了不同的看法。

本文試圖說明霸權理論從一開始便是建立在對於「離散」與「差異」的特定理解上，而此一特定理解對於霸權理論及其延伸出來的基進民主政治想像產生了極爲根本的影響。[9] 我們認爲即便拉克勞在晚近的書寫中，陸續針對敵對概念提出反省與修正，並在《論民粹理性》中花了相當篇幅討論了「異質性」，但是，拉克勞仍未真正地突破原先的架構，或其政治存有層次上的想像。在本文接下來的第一部分，將首先說明「離散」與「霸權形構」的關係。第二部分則將重點放在分析拉克勞進一步區分「敵對」與「錯位」之後，是否進一步調整了「離散」的理論位階。第三部分旨在評估晚近提出之對於「敵對」的進一步修正以及「異質性」的概念，對於霸權理論所產生的影響。結論中則討論在拉克勞理解「敵對」、「離散」與「異質性」的特定理論脈絡中，其基進民主的限制以及與其他不同立場的基進民主理論對話的起點。

貳、離散與霸權形構

在《霸權》中，拉克勞與慕芙強調，霸權只會在一個可以進行「接合實踐」（articulatory practice）的場域中發生。倘若，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系

[9] 而也就是在這個立場上，他們的基進民主與 Deleuze / Guattari 以及 Negri 等人所提出的基進政治實踐分道揚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統中，所有的「元素」（element）[10] 都轉變成結構[11] 中的「環節」（moment）[12]，則根本沒有接合實踐的可能與必要，亦無所謂的「霸權形構」（hegemonic formation）可言（1985：134）。何謂「霸權形構」呢？拉克勞與慕芙指出：

> 一個藉由設立節點（nodal point）以及建構漸進關聯性認同（relational identities）所形成的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便是葛蘭西所稱的*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結合歷史集團不同元素的連結——不是一個具有歷史先驗性的整體（unity），而是一種離散中的規律——與我們關於論述形構的概念吻合。如果我們從歷史集團形成的敵對領域的角度來看，歷史集團就是我們所說的**霸權形構**（1985：136，粗體字為原文強調）。

所謂的霸權形構，便是在原本散亂的場域中建立接合不同元素的規則，並透過規則的持續擴張，將更多的元素轉化成環節，進而造就「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此一被視為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歷史集團」同義的霸權形構，一方面強調的是離散的元素必須透過接合實踐建立成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面則強調，被接合的元素之間沒有先天內在的關聯；在元素之間建立起來的整體所依據的是一種「離散中的規律」（regularity in dispersion）。「離散中的規律」這個說法來自於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識考古學》中關於「論述形構」的討論，但其相關的理論脈絡則可以追溯到拉克勞與慕芙對於黑格爾（Hegel）的解讀。兩者的關係相當密切，在此我們先討論後者。

拉克勞與慕芙指出，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狂飆運動所極力追尋的便是克服十七世紀理性主義所建立的各種二元對立（身／心，理性／情感，思想／感官），並建立一種新的統一。而此一追尋所導致的後果卻是更進一步

---

[10] 所謂的「元素」指的是尚未被整合進特定論述系統的分殊位置（Laclau & Mouffe, 1985: 105）。

[11] 拉克勞並未在概念上區分結構與系統，且往往在討論論述形構時，也交互使用系統或結構等說法，因此本文亦不擬針對這些概念作出區分。

[12] 相對於元素，「環節」指的便是結構中的分殊位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確認了古典希臘時期的和諧宇宙一去不返，且遺留下一個極大的爭議：在除魅的世界中，支離破碎的零星片段組織而成的整體，究竟是人爲接合的結果，或者作爲自然的中介？而在哲學論述中，上述兩者的區別並非清清楚楚，而是充滿了模糊地帶（1985：94）。拉克勞與慕芙認爲，作爲浪漫主義顛峰以及首位「後啓蒙」哲學家的黑格爾，其辯證哲學則是此一模糊的極致表現，而其中的關鍵便在於黑格爾以「否定性」（negativity）取代了「實定性」（positivity）。黑格爾藉由將矛盾引入理性之中，使得歷史理性得以開展，並達至最終的統一，而在這個統一的過程中，一方面見證了理性收編的強力；另一方面將矛盾引入統一本身，也蘊含了瓦解此一統一的不安定因子。拉克勞與慕芙主張，在黑格爾這個由「過渡」、「關係」與「差異」所構成的現代性中，其核心問題仍舊環繞在將矛盾收編成爲系統的一部份以達成統一的過程，或者，透過差異所達致的同一性，究竟是一種「中介」的過程，亦或是一種「接合」的過程？前者意味著某種內在必然的邏輯開展與體現，而後者則訴諸偶然、外部的實踐。[13] 拉克勞與慕芙認爲，黑格爾的辯證哲學以「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作爲一個自決（self-determining）封閉的整體，排除了偶然性。然而，在「絕對觀念」無法解釋自身生成變化的必然性的情況下，黑格爾未能成功地證成普遍（整體）與特殊（差異）的調和是一個內在、必然的過程，也因此無法解釋歷史辯證本身所需的動力來源。同時，達成同一的辯證中介（dialectical mediation）也會持續處於一種不完整的狀態（1985：95；Widder, 2000: 122）。易言之，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歷史辯證的發展過程，是建立在一連串意識的偶然決斷之上，不存在著內在法則，也無法達成終極的完滿。[14]

---

[13] 眾所周知地，同一性的問題是西方哲學的老問題，例如，海德格（Heidegger）便曾言，西方哲學以 2000 年的時間，才完整地將同一性的問題以「中介」與「綜合」（synthesis）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以費西特（Fichte）、黑格爾與謝林（Schelling）爲代表的德國觀念論，便是繼萊布尼茲（Leibniz）與康德之後，以同一性問題爲其超驗反省核心的哲學傳統。其對同一性的反省，著重的不是事物本身內在的整體性，而是主體（性）與對象／客體（性）之間的中介與綜合（Stambaugh, 1969: 9-10）。

[14] 此一對於黑格爾的解讀，以及關於“universal”的進一步討論，引發了不少的爭議，例如 Judith Butler 與 Slavoj Žižek 都對拉克勞（與慕芙）的解讀提出質疑，關於三位作者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此對黑格爾式整體形成過程的詮釋基礎上，拉克勞與慕芙進一步地批判將「社會」視爲完滿封閉整體的觀點。他們認爲，「社會」既不具有本質，亦非由沿循著特定邏輯的對象之間的既定關係組成。「社會」是接合實踐的結果。其中，不同的對象之間的關係，不是必然的邏輯或法則的體現，而僅只是偶然性的展演，且是無法定於一尊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接合實踐都無法達成最終的圓滿。換句話說，沒有作爲完滿整體的「社會」（society），只有建構而成的「社會空間」。而社會秩序亦是在本質開放的社會空間中所形成的暫時形貌，終究無法完全收編所有的差異（1985：96）。

從對黑格爾的討論一路下來，拉克勞與慕芙一再地強調整體形成所涉及的接合實踐，以及接合實踐必須以偶然性爲前提，並依此批判黑格爾將所有的差異轉化成邏輯上的矛盾，而試圖完成收編達至統一的理論設計。總地來說，他們一方面強調整體偶然建構的特質，另一方面則強調整體不可能收編所有的差異，也因此不可能達成終極的完滿。如果我們接受拉克勞與慕芙的觀點，認爲差異不該被理解爲邏輯上的矛盾，或終究（或至少潛在地）成爲可以被收編進入整體的對象，那麼什麼是「差異」呢？拉克勞與慕芙在這個階段並未提出清楚的說明。不過我們可以試著透過他們對於「離散」，來回答此一問題。

拉克勞與慕芙指出：「**唯有相對於一個設定它們〔元素〕之間的整體性的論述時，一群元素才會顯得片段、離散。在論述架構之外，顯然不可能論及片段或元素。**」（1985：96）。換句話說，拉克勞與慕芙一方面強調所有由元素所組成之整體的形成，都不是因循著某種內在法則的邏輯發展，而是一種偶然的接合結果；另一方面則強調，元素的離散狀態乃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加以觀察的結果，而非有一種先在本然的離散狀態。而他們認爲自己與黑格爾不同之處便在於，他們所定義的整體（系統）之外的元素與系統並不構成矛盾關係，也不必然會被吸納成爲系統的一部份。然而，值得強調的是，他們也不認爲有所謂純粹離散或差異的存在。這個論

間的黑格爾辯論，請參閱 Butler, Laclau, Žižek (2000: 15-41, 59-64, 99-114)，另可參閱 Dallmayr (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在拉克勞與慕芙討論傅柯的《知識考古學》中「離散中的規律」時，得到進一步的確認。[15]

考古學階段的傅柯，以純粹描述論述形構的規則爲其主要的研究課題（1972：27）。傅柯否定了論述形構乃基於主題、對象、風格，或概念使用等一致性而建立起來的假設（1972：21-76），亦展現他一貫的反人道主義的立場，不以主體或作者作爲論述的起源或論述一致性（例如某某全集）的捍衛者（1972：27, 200），亦不以揭露某個被隱藏或扭曲的事實真理爲職志（也因此傅柯向來拒絕使用「意識型態」這個概念）。傅柯指出，考古學「並非重構*推論鏈*，或是畫出一個*差異圖表*（如語言學家所爲），而是描述**離散的系統**」（1972：37，粗體字爲原文強調）：

> ……我們所處理的是離散元素。如果我們可以推定其對象，陳述，概念與理論選擇形成所依據的規則，那麼，離散本身——以其罅隙、不連續性、混亂纏結、無法相容、置換與取代——的獨特性便可被描述出來：如果眞的有一致性，那麼一致性並不存在於可見，具水平一致性的構成元素之中，而是存在於其形構之先，在一個使形構成爲可能並管轄該形構的系統中（1972：72）。

傅柯如此定位考古學：

> 一個關於論述的論述，然而它並不試圖發掘任何潛藏的法則，或者某些必須被其釋放的藏匿的源頭。它並未嘗試建立自身，以自身爲起點或作爲一種一般性理論，而將其他的論述視爲具體展示。它所試圖作的乃是部署一種不可能被化約爲絕對參照軸心的離散，以及去中心的操作，不給予任何中心特別待遇。（1972：205）

的確，《知識考古學》的重心乃是描述在離散中形成論述形構的「規則」，以及透過論述形構的規則所建構出來的論述對象，此即其所謂的純粹描述的意義所在。然而，在傅柯強調不可化約的「離散」，以離散作爲其論述

[15] 雖然拉克勞在後來的作品中，試圖淡化與傅柯的關係（2000：285），但是在《霸權》中，拉克勞與慕芙的確是以傅柯在《知識考古學》中關於論述形構的討論，作爲建構他們自己的論述理論的起點與對話對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構規則的同時，卻又認爲規則或一致性乃存在於「使形構成爲可能並管轄該形構的系統中」。Hubert Dreyfus 與 Paul Rabinow (1982: 79-100) 指出，上述說法只有讓傅柯更加泥足深陷於方法論上的問題。首先，傅柯必須面對的便是觀察者的定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是否能夠因此將考古學定位爲純粹描述（考古學者如何掌握此一以離散爲唯一原則的論述形構規則？論述形構的規則，或者所謂的「論述場域」是否有其界限？）的問題。換句話說，作爲一個考古學者是否可以逃脫傅柯在《詞與物》中所指出的那一連串「人及其化身」（man and his double）的困境？[16] 考古學者是否將自己放在一個非歷史的特權位置，忽視了描述本身的規範性？此外，究竟傅柯所謂的「規則」指的僅是針對論述形構在離散中的規律性的描述（description），或是一種必須遵守的規定（prescription），則是另一個棘手卻又無可迴避的問題。

呼應了上述 Dreyfus 與 Rabinow 對傅柯的解讀，拉克勞與慕芙進一步指出傅柯的論述形構理論缺乏「界限」的概念。[17] 拉克勞與慕芙認爲傅柯討論論述形構時所稱的「離散中的規律」[18] 應該包含了兩個面向：離散與規律，但是傅柯過份強調離散，卻未針對「規律」提出充分的說明，以致於無法清楚交代論述「形構」或「規律」的意義。因此，不似傅柯以離散爲前提，拉克勞與慕芙強調，「離散」僅能藉由缺乏由共同的對象，風格，概念或主題構成的整體這個角度來加以理解（1985：106）。「離散」需要「整體」與「規律」作爲其參照點，以對映出其離散的狀態。也因此，當我們思考論述形構及其規律時，不可能純然只從「離散」的角度來思考，倘若如此，便只有純粹的差異，而無所謂的「整體」或「形構」可言。換句話說，涵攝一群社會行動者或一組論述環節的論述整體，之所以可以被稱之爲整體，乃在於此一整體與其外部被區分開來，亦即，在被回溯性[19] 地

---

[16] 關於「人及其化身」相關討論，請見 Han (2002: ch2)；林淑芬（2004）。

[17] 事實上，傅柯早期討論 Bataille 以及 Blanchot 的作品中所處理的便是界限的問題，請參閱林淑芬（2003b）。

[18]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傅柯提出的論述形構的規律，究竟是「離散中的規律」，或者「離散作爲規律」仍值得商榷（Widder, 2003）。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拉克勞與慕芙的理解顯然是前者。

[19] 這裡強調「回溯性」乃是因爲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雖然離散是論述形構的前提(否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知到的離散差異場域中切割出「整體」與「整體之外」的部分，而這個切割與區分，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便是整體的「界限」（1985：143）。然而，界限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該如何掌握論述整體與界限的關係，而整體形構的偶然性與不可能完滿的性質與界限有關嗎？在《霸權》一書中，「敵對」是理解這些問題的關鍵。

參、敵對、錯位與界限

一、敵　對

拉克勞與慕芙以 Lucio Colletti 討論康德「真實對立」（real opposition）與「邏輯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的區分爲起點，指出「敵對」既非對立關係中的 A 與 B 的關係，亦非邏輯上的 A 與－A 的矛盾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否定性。拉克勞與慕芙認爲，不論是真實的對立或邏輯上的矛盾都預設了已然存在的整體，但是「敵對」作爲一種否定性，不是對於完滿先在的認同或整體的否定，而是對於對象性／客觀性（objectivity）本身的限制。更精確地說，敵對關係意味的是整體無法形成，而非在預設整體的情形下所產生的對立或矛盾。然而，問題是，整體何以無法完滿形成，而敵對又以何種方式存在？拉克勞和慕芙的回答是，由於「他者」（Other）的存在，使完滿的整體無法形成，「只要有敵對存在，我便無法作爲一個完整的自我」。非但如此，「與我敵對使我無法如此存在的力量亦然：其客觀的存在僅是我的非存在（non-being）的象徵……無法作爲一個完滿的實定性（positivity）而固著下來」。因此，嚴格說來，敵對不是一種對象關係（object relation），而是一種暴露「對象性之界限」（limit of objectivity）的關係（1985：125）。拉克勞與慕芙接著強調，此種敵對限制不能被視爲將兩個疆域區分開來的疆界（frontier），因爲那將會預設「疆界內」與「疆界外」的疆域，都是實定客觀的存在（1985：126）。對他們而言，所謂的「界限」存在於整體內部，顛覆整體的完滿性（1985：127）。只

便無形構的必要性)，但是，離散又只能從相對於整體的這個角度來加以認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令人困惑的是，在提醒我們不應混淆界限與疆界的區別之後，拉克勞與慕芙在解釋整體形構的機制時卻指出：

> ……只有將界限轉化成疆界，建立一個等同鏈，而將界限之外建構成自己**所不是者**，一個形構始能**指涉自我**（亦即，構成自身）。一個形構唯有藉由否定性（negativity）、區分（division）與敵對，始能將自己建構成一個整體化的範圍（1985：143-44，粗體字爲原文強調）。

在上面這段說明論述形構的引言中，有兩個關鍵：其一是將「界限轉化成疆界」；另外，則是對於敵對、區分與否定性的強調。拉克勞與慕芙何以要強調界限轉化成疆界的過程呢？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機制呢？其與敵對何干呢？在《霸權》中並未針對疆界與界限的區分以及之間的轉化提出直接的說明，但是在拉克勞稍後發表的〈空符徵與政治何干〉中，我們可以找到比較多的線索。在該文中，拉克勞指出：「意義指涉的可能性就是系統，而系統的可能性便是界限的可能性。和黑格爾一樣，我們可以說，欲思考某個事物的界限便是思考在界限之外的是什麼……」（1996b：37）。而什麼是界限之外呢？這個關於「界限之外」的問題，對拉克勞而言，正是困難之所在：既是「界限之外」，則顯然不屬於系統內部，不是系統本身所能指涉者。然而如果我們接受系統的可能性便是系統的界限，而思考系統的界限必得從界限之外開始，那麼，無法指涉「界限之外」是否便意味著無法指涉系統整體？

二、空符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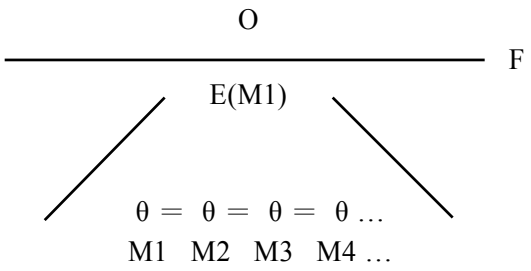
拉克勞試圖以「空符徵」（empty signifier）概念來突破此一困境。拉克勞認爲，如果界限之外無法被系統所指涉，那麼便只能夠透過系統的「崩潰」或「顛覆」來予以呈現。「空符徵」，亦即，一個不與任何符指連結的符徵，顛覆了傳統意義指涉系統中每一個符徵都與一個符指（signified）對應的邏輯。易言之，空符徵成爲一個無法進行指涉，或僅能指涉「空無」的符徵。系統中空符徵的存在，意味著系統內部有一個無法進行指涉的環節，其唯一可以指涉的便是系統本身的不完滿。簡言之，拉克勞的推論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如下：透過空符徵指涉系統的界限之外，進而指涉的系統的界限，最後達成的便是指涉系統本身的整體性。拉克勞強調，空符徵不是某個無法實現指涉的符徵，而是構成系統之系統性所必須。而這也是拉克勞之所以認爲所有的系統總是已經是「錯位」（dislocated）的系統的原因。然而這個空符徵與系統內部的其他環節的關係爲何呢？

相對於系統的界限（之外），系統內部的環節在系統中各自佔據了不同的差異位置，然而，也因爲它們都屬於系統的內部，所以這些差異的環節彼此之間也產生了等同關係。換句話說，系統中環節與環節之間，同時具備差異與等同的雙重關係。上述的空符徵則與其他符徵不同。空符徵不是佔據了另外一個分殊位置的符徵，而是代表了系統的「系統性」或「整體性」的符徵，此與系統仍舊會產生一個尷尬的關係：如何在一個由分殊符徵構成的系統中找到一個可以體現空符徵的符徵呢？在此以圖 1 說明上述邏輯與問題。

圖　1



資料來源：本圖參考 Laclau (2003: 303)，並由作者作細部修改。

在圖 1 中，O 所代表的是界限（之外），M1～M4 代表的是系統內的環節，F 是疆界。倘若 M1, M2, M3, M4……要形成一個整體，便需要將彼此之間的差異暫時懸置而成爲等值的 θ，而 E 則代表空符徵，負責指涉系統的界限，亦即系統本身的整體性。倘若空符徵存在於系統之內，但系統中所有的符徵都與特定符指連結，那麼，如何出現足以指涉系統性的符徵呢？拉克勞的想法是，只能由系統中某個特定的符徵體現空符徵的功能。但是由於該特定符徵原本不是空符徵，而是連結著某個特定的符指，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這個體現將是一個永遠都會顯得不恰當的體現（1996a：40）。而至於哪一個特定符徵可以體現此一功能的問題，拉克勞認爲那是社會不均衡發展所致，無法透過理論推演得出。[20]

由某個特定的符徵體現空符徵的功能（例如圖示中的 M1），是拉克勞詮釋霸權概念的另一種方式。拉克勞以盧森堡（Rosa Luxemburg）討論大罷工爲例，試圖說明某個特定符徵體現空符徵的過程：在一個高度壓迫的沙皇政權，社會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訴求。不同的訴求，例如，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原本是一個特殊的訴求，但是從其作爲反抗沙皇高度壓迫政權運動中的一員來看，工人的訴求超越了自身的特殊性，而與其他的訴求建立了等同關係，也因此工人訴求同時被等同及差異的兩種邏輯穿透。不僅工人訴求如此，運動中的其它訴求也是如此。重點是，拉克勞認爲，隨著等同鏈愈益擴張，等同鏈作爲一個整體便愈需要被代表。倘若工人訴求（或其他任何一個訴求）成功地取得擔任代表的地位，那麼，我們可以說一個霸權關係被建立起來了。因爲那意味了某一特定的訴求得到了認同，而轉變爲帶有普遍性的訴求，並進而在不同的訴求之間建立起一個共同空間（1996a：43）。[21] 然而，此一霸權式的勝利也是一個帶著風險的勝利，因爲在工人運動體現空符徵功能的同時，需要與其原先所連結的特定內涵逐漸分離，以呈現反對沙皇運動中不同訴求的等同性，亦即整體性。同樣的，反抗運動的共同敵人，亦即，沙皇政權，也不再只是具有特定內涵的壓迫者。隨著反抗運動的逐漸擴張，沙皇政權也漸漸與其特定內涵脫節，成爲純粹的邪惡或否定性的體現。換句話說，沙皇政權成了反抗陣營所打造出來的共同空間之所以不完滿的罪魁禍首（1996a：40-45）。

上述的例子爲空符徵與霸權的關係提出了比較具體的說明，但是也就是在這樣的例子中，我們發現了理論內部的張力。先前我們討論界限的問題時，界限指出的是所有系統內部必然的不完滿，並說明了此一不完滿同時也是系統之所以可能的條件。不過在該討論中未涉及到具體的敵對對

[20] 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均衡，系統內部的環節並非處於一種平等的狀態，也因此，系統整體形成所依賴的環節中的等同關係，總是受到差異關係的抵抗，而系統中的環節體現空符徵的可能性也就不一而足。

[21] 拉克勞稱之爲 communitarian spa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或者因爲共同的外部敵人（一如在前例中的沙皇政權）而產生的等同關係。此外，此時界限仍只是界限。但是在上述的例子中，整體的形成乃源於在共通的敵人與我們之間劃上疆界，並且隨著各自的擴張，不論整體或敵人都漸漸地與其原先的內涵分離，成爲相互敵對否定的關係：「我們」的不完滿是因爲有敵人的存在；而若從敵人的角度來看，亦復如此。也就是說，在這裡我們的確看到了將「界限轉變成疆界」的操作，以及所謂的敵對否定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打造敵我對立的空間。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將界限轉變成疆界，建立二元敵對的空間是形塑整體的唯一機制？而這個理論操作似乎也違反了《霸權》中強調「敵對」不是來自外部具實定性的對象，而是系統內在的顛覆的立場。

三、敵對與錯位

針對這個問題，Slavoj Žižek 早在一篇評論《霸權》的文章中便已指出：拉克勞與慕芙試圖藉由「敵對」概念避免傳統以超驗主體，或預設一個完滿的社會整體作爲意義或行動的來源。然而，Žižek 認爲如果沒有進一步將「敵對」區分成「真實敵對」（Real antagonism, pure antagonism）與「現實中的敵對」（antagonism in reality），便仍然無法避免本質主義。所謂的「真實敵對」指的不是任何特定歷史中的敵對，而是內在於所有自我認同的核心中不可化約的匱乏（Lack），[22] 是自身完滿認同之終極不可能性，

[22] 就拉崗（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而言，「匱乏」最早出現在討論存有的匱乏上，因爲匱乏所以產生慾望，而主體便是環繞著這個匱乏，透過持續不斷的認同（identification）機制試圖填補匱乏而建構出來的。受到這個觀點影響的政治理論，便是在強調認同建構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指出認同建構終將不可能完滿。而 Žižek 此處對於拉克勞與慕芙的批評，便是集中在認同的不完滿應是來自於內在的匱乏，在所有認同建構之先便已存在了，而非於認同建構之後，來自外部的威脅，破壞了認同的完整性。針對「匱乏」在基進民主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其相對應的「豐盈」（abundance）的相關辯論，參見 Tønder and Thomassen (2005)。在這本書中，兩位編者邀請了不同的作者分別闡述匱乏與豐盈與基進民主的關聯。然而，筆者認爲豐盈與匱乏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區分，畢竟豐盈與匱乏往往是一體兩面（可參考書中 Marchart, Widder, Norval,及拉克勞的論點）。筆者原則上同意 Widder 的觀點，就是不論是豐盈或匱乏，似乎都預設了認同是必要的，只不過認同不可能固著下來。雖然兩者提供的詮釋強調之處或有不同，但是都未能挑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便是認同之必要（Widder, 2005: 32-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非任何造成認同無法完滿的外敵。而「現實中的敵對」則是不同的主體位置之間的對抗，其形成乃是藉由將自身的不完滿「外部化」與「他者化」，致使某個被「指定」的「他者」成爲遮掩自身內在匱乏與最終不完滿的代罪羊（Žižek, 1990: 252-53）。Žižek 認爲，倘若沒有作出上述區分，敵對很容易便被視爲一種來自外部的威脅，甚至產生如下宣稱：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威脅，自我事實上可以是一個完滿的整體，因而將整體的不完滿怪罪在所謂的外來威脅之上。其實，針對 Žižek 的批評，拉克勞在〈空符徵與政治何干〉之前的《我們這個時代關於革命的新反思》（後稱《新反思》）中，已提出了「錯位」（dislocation）與敵對的區分；試圖以前者回應 Žižek 所稱的真實敵對（1990：39），而敵對則意味著外部化所有內在於認同之中的匱乏。

如果在《霸權》中，拉克勞與慕芙認爲所有的認同都是敵對式的認同，那麼，在《新反思》中，隨著「錯位」的出現，似乎可以產生一個具突破性的發展，亦即，即便所有的認同都是錯位的認同（不可能完滿的認同），但是並非所有的認同都是敵對式的認同，敵對僅是面對錯位的一種特定的方式罷了。不見得所有的認同與整體都得要採取敵／友對立的方式，亦即透過敵對化他者，來遮掩內部的不可能性。事實上，透過引入其他的倫理立場，例如，Levinas-Derrida 式的他者倫理，強調對他者的無限開放與回應，與他者保持一種非敵對式的關係便是其他的可能性之一（Norval, 2000: 223-224）。只是，拉克勞顯然並未採取此一立場。對拉克勞而言，敵對仍是建立認同的不可或缺的面向。但是也因此就理論邏輯而言，拉克勞將敵對與錯位，疆界與界限混淆在一起。

一如 Urs Stäheli 所指出的，即便在《新反思》這個階段，「錯位」基本上指的是認同（或結構）自我指涉的過程必然涉及的排除（界限之外），以及此一排除所形成的內在不穩定與終極的不完滿，但是「錯位」仍含混地被理解爲外部對內部的否定，而未能真正與「敵對」在概念上清楚地區分開來。更重要的是，敵對關係依舊被定位爲面對或處理錯位（例如詮釋錯位所形成的斷裂空間）的唯一方式（Stäheli, 2004: 234；Widder, 2000: 133）。換言之，在這個階段，拉克勞仍將「錯位」與「敵對」視爲一體兩面。兩者的概念分工在於以「錯位」凸顯認同內部無可避免的不完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此一內部的不完滿只能透過「敵對」的方式來展現。也因此在〈空符徵與政治何干〉這篇文章中，拉克勞仍然堅持：

> **敵對及排斥**是所有認同的本質。如果缺乏界限，使得（**非辯證的**）否定無法透過界限而建立，我們將會有一個無限的差異散亂，因爲系統界限之闕如會使系統認同成爲不可能。但是，這個「藉由敵對之界限以構成差異認同」的功能，同時也就是使這些差異不穩並顛覆這些差異的原因（1996c：52；粗體字爲筆者強調）。[23]

至此，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檢視早先提出的「離散中的規律」以及論述形構與界限的問題。嚴格說來，拉克勞與慕芙在《霸權》中所強調的「界限」與敵對性的「疆界」其實是一個連續體。界限指的是整體不完滿的本質，整體內部的匱乏。而劃疆界的行動則是敵對化此一不完滿的機制。透過劃出疆界、建立共同敵人的同時，暫時取消了個別差異（特殊）促成了等同鏈的形成，並以空符徵（普遍）再現此一整體。因此，離散中的「規律」指的是一種以「敵對」爲核心的接合實踐：論述（結構、系統）乃是藉由敵對疆界，強化等同邏輯（而非差異邏輯）以及空符徵的再現機制所建立起來的整體。此一整體並非固定不變的空間，會隨著特定符徵體現空符徵的程度的高低，展現不同的收編能力，亦即擴張等同鏈的能力。雖然我們在談及論述形構時，說明了所有在系統中的環節同時被等同邏輯與差異邏輯所穿透，但是，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這個階段，差異需要被暫時懸置。一如「離散中的規律」這個說法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亦是不對稱地向規律傾斜，「離散」並非其關注的重點。「離散」雖然被視爲論述形構的先決條件（否則便無接合的可能性），但是離散永遠只能透過論述整體的角度來加以觀察，建構整體似乎才是政治行動的目的與根本邏輯。

的確，拉克勞曾很清楚地表達，只有離散而無疆界，認同將無法形成，而認同的形成對政治而言極爲關鍵。換句話說，雖然不斷地對於特殊主義

---

[23] 在這段引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拉克勞對於「界限」這個概念的使用不是非常嚴謹。基本上引言中所說的界限，都已經是敵我「疆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的認同政治，以及建立在此一基礎上的多元主義提出挑戰，但是拉克勞並未質疑認同建立的必要性——至少是對政治行動或社會運作而言（1996a：2000）。其對於完滿社會之終極不可能性的強調，並未導致他放棄從建構社會的行動的角度來理解政治。事實上，拉克勞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一個無法產生任何意義固著的論述，是一種精神病（psychotic）的論述 」（Laclau & Mouffe, 1985: 112；Laclau, 1990: 90-91）。[24] 從他的角度看來，這樣的狀態不僅無法分析，且甚至不應被視爲社會分析的對象。也就是說，拉克勞並不一味地頌揚差異，而是提醒我們認同與意義體系仍是必要的，雖然永遠不會完滿；建構社會的嘗試終將失敗，只不過這樣的嘗試仍會前仆後繼，永無止盡。

批評者指出，拉克勞的理論立場仍不免讓人聯想到黑格爾。在同樣強調否定性的前提下，拉克勞認爲黑格爾所處理的是邏輯上的矛盾關係，否定性只是理性的狡獪伎倆，其中必然性仍然主導一切，以致差異被視爲認同的對反，特殊性被視爲普遍性的對反，而原本對於否定性的強調，最終也臣服在觀念開展的肯定性當中（Widder, 2000: 121）。而他堅稱霸權理論雖然主張整體形構以及劃疆界的必要性，也認爲必須透過整體始能認識離散，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強調了偶然性與接合實踐的必要性，而未以必然性置換偶然性。在此一前提下，所有的霸權行動都是在無可決斷（undecidable）的場域中進行，而任何霸權行動都無法充分地收編所有的差異。只是，光是藉由對於偶然性、決斷以及終極的不可能性的強調，是否就足以讓拉克勞與黑格爾劃清界限，並進而宣稱「敵對」是「非辯證式否定」呢？在強調建立整體的必要性的霸權理論中，是否仍然可以看見黑格爾的幽靈？

傅柯在〈論述的秩序〉一文中，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與黑格爾徹底分道揚鑣的不易。他認爲，倘若不能看清自己用以反對黑格爾思想的立場中仍殘留的黑格爾哲學元素，那麼黑格爾就不會真正地消失（1984：134）。Nathan Widder 對拉克勞的觀察是，只要拉克勞（與慕芙）堅持意義需要認

[24] 當然，拉克勞在此所使用的「精神病」必須放在 Lacan 精神分析的脈絡中來理解。所謂的精神病的論述，指的是一種缺乏足夠的接合節點（nodal point）所引發的語言混亂：符指不斷地自與符徵的連結中滑落，而造成意義指涉的災難（Evans, 1996: 156-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而認同需要整體，以及建立整體所需的疆界與排除，那麼霸權理論就無法真正逃離黑格爾（2000：123）。[25] 尤有甚者，對於所有認同都是敵對式的認同，以及認同建立過程必然涉及將「界限轉化成疆界」的強調；或者以「真實／純粹的敵對」外部化爲「現實的敵對」的操作爲政治行動的必要機制等立場，皆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霸權理論中對於敵對的普遍性預設，不僅化約了離散的獨立地位，也變相地啓動辯證運動的機制：所有的離散差異，似乎都只能從整體的角度來觀察，且成爲整體收編擴張的條件。

一反過去的堅持，拉克勞在晚近的書寫中提出了一些理論的反省與修正，而其中的最受注目的焦點之一便是調整了敵對與界限的關係。他指出在《霸權》中，他與慕芙的確將界限與敵對式的疆界視爲同義詞，並且認爲所有的認同或客觀性都是建立在敵對式的排除之上。但是，他坦承這樣的作法，將造成兩個理論上的瑕疵。首先，敵對僅是面對錯位的方式之一，是一種特定的論述銘刻與縫補錯位的方式，「並非所有的『錯位』都必須以敵對的方式加以建構」。其次，敵對並非根本的「排除」，[26] 而是將社會空間二元對立化的機制，而敵對造成的二元對立疆界的兩造必須同時存在，否則便無法維持敵對所建立起來的再現空間。[27] 拉克勞承認，雖然他在《新反思》中，已經藉由敵對與錯位的區分，試圖以後者指稱內在於整體再現機制中的根本危機與弔詭，但是在該書中，此一弔詭仍舊預期透過敵對機制加以排除。因此，錯位或敵對仍處於一個連續的再現過程。[28] 拉克勞進一步指出，仍有其他非敵對式的排除形式，不涉入由錯位與敵對所

[25] Widder 甚至認爲「空符徵」，作爲體現系統性的弔詭存在，便是黑格爾體系中涵納極端的中介物（2000：121）。

[26] 也就是說，拉克勞認爲敵對是敵我關係，但是不是我們先前所討論的界限，或是整體內部不可能完滿的匱乏。

[27] 此處所稱的「再現空間」指的是透過敵對化機制，疆界的兩邊各自自我指涉成爲一個整體。亦即拉克勞所稱的 communitarian space。

[28] 也就是說，對拉克勞而言，其所提出的錯位，仍是爲敵對關係作的理論準備。如果錯位指的是整體中無可避免的缺口，那麼敵對便是將此一缺口外部化爲二元對立的敵人，而試圖彌補缺口，進而維護整體的完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構成的「收納式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29] 的再現空間，例如，黑格爾所稱的「沒有歷史的人」（peoples without history）以及馬克思的「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便是這一類無法再現者（Laclau, 2004a: 318-319）。

在其最新的著作《論民粹理性》中，拉克勞以相當大的篇幅討論馬克思的「流氓無產者」以及 Bataille 的「異質性」。已有論者指出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轉折，並進一步從解構的倫理立場出發，宣稱拉克勞與慕芙的霸權理論核心應從敵對轉移到異質性，始能更貼合基進民主的訴求（Thomassen, 2005）。針對這個說法，我們有必要較深入地探究，拉克勞在《論民粹理性》中所瞭解的異質性是否與早先對於離散元素的詮釋有著根本的差異，以及敵對／錯位在這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

肆、異質性

《論民粹理性》中關於異質性的討論，始於對等同邏輯操作限制的檢討。我們知道，在拉克勞原先的理論建構中，所有被納入系統內的環節都被兩種邏輯，亦即等同邏輯與差異邏輯所穿透。雖然透過等同邏輯的操作，以及空符徵的產生，系統得以形成，並暫時性地懸置了原本各自不同的元素之間的差異／特殊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差異／特殊性的全然消失。拉克勞認爲在特殊性仍被保留下來的情況下，某些訴求會因爲與等同關係中某個訴求抵觸，而無法被納入該等同關係中。也就是說，某些訴求無法被該等同關係與其敵對勢力所建立起來的再現空間收編（2005：139）。對此，拉克勞提出了如下的區分：有一種排除是敵對式的排除，由等同關係所建立起來的認同與其所排除者相互構成（亦即，敵／我的互生關係）；

[29] 義大利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在 *Homo Sacer* 一書中，將「例外」（exception）定義爲 'inclusive exclusion'，同時也指出例外是整體的可能性條件，此一論點與拉克勞的談法極爲接近。拉克勞至今尚未針對 Agamben 的作品提出任何正式的討論，僅在一個談話場合中，指出 Agamben 的理論中缺乏「敵對」的面向。這是一個有趣的觀察，也是一個可以繼續追問的線索。筆者希望將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針對同樣被定義爲 inclusive exclusion 的「敵對—錯位」與「例外」進行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另外一種排除則是非敵對式的排除，被排除者無法取得被再現的可能（2000：140）。拉克勞認爲後者即是類似黑格爾所稱之「沒有歷史的人」，或拉崗所謂的「渣滓」（*caput mortuum*）。拉克勞稱之爲「社會異質性」（social heterogeneity），並且強調，社會異質性不是在再現空間內部的危機與弔詭，透過空符徵與敵對化的操作便得以（暫時地以及局部地）去除弔詭。社會異質性完全置身於再現空間之外。

因此，我們可以說，拉克勞提出異質性概念的用意，便在於突破敵對所造成的二元對立空間的僵化；強調這個空間變動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不可能完滿的特性。一如拉克勞所言，一個完全的再現空間，亦即拉克勞所稱的「同質性」（homogeneity），預設了所有社會實體都將被吸納進入等同關係之中（以非敵即友的形式展現），而造成無可撼動的敵對疆界。但是拉克勞坦言，不僅疆界的置換經常發生，疆界的完整性也不時地被無法再現的異質性所阻斷（2000：141）。而由於這些異質存在無法被疆界所圍堵，也因此無法被化約成辯證過程中的差異。拉克勞呼應了 Peter Stallybrass 討論馬克思與恩格斯早期書寫中的「流氓無產者」的說法，認爲所謂的「流氓無產者」是一群被視爲無法與工業無產階級結盟，但卻寄生在大城市中到處流竄的雞鳴狗盜之輩。這些人不是定義下的生產者，當然也不會像無產階級一般，被賦予歷史行動者的角色，他們是被放置在由生產關係所界定的歷史性之外的一群人（Laclau, 2005: 144；Stallybrass, 1990: 89）。「流氓無產者」便是所謂的異質元素，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具體存在於大城市中，更是存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中的一樁「醜聞」。

流氓無產者的確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政治接合的團體，而它之所以被稱爲醜聞的原因，正在於它使得我們看清了歷史不是一個一元、一致的故事開展的場域，我們亦無法透過辯證模式爲歷史變動提供解釋（Laclau, 2005: 146）。然而，弔詭的是，流氓無產者所象徵的異質性便是政治操作的空間之所在，也是使整體一致性得以建立的可能性條件。在進一步討論了 José Nun 試圖以「邊緣群眾」（marginal mass）重新解讀 Marx 的「相對剩餘人口」（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並將其與「工業後備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dustrial reserve army）區分開來之後，30 拉克勞再次強調，不論是「流氓無產者」或者 Nun 所稱的「邊緣群眾」都應該從作爲資本主義積累的「外部」來加以理解，而任何「內部」的建構，都是企圖掌握外部的嘗試。他認爲，外部與內部之間並非辯證式的否定關係，外部並不以否定內部的方式而存在；外部與內部之間亦非如同內部中敵對的兩造一般是一種如影隨形但卻相互否定的關係。外部僅僅只是被排除者。因此，拉克勞說「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決定歷史中的人」，而異質性也不會被辯證地解消（2005：148）。但是不具決定作用，並不意味著沒有關聯。畢竟對拉克勞而言，異質性是整體性（或同質性）的可能性條件，也因此，異質性不可能與敵對的建構全然無關。

拉克勞重申了他與慕芙在《霸權》中的觀點，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關係爲例。他強調工人與資本家之間沒有必然的敵對關係。如果所謂的工人僅是在概念上被定義爲「出賣勞動力的人」，那麼光是從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的立場出發，並不足以推論出工人必然會抵抗剝削。敵對乃建立在生產關係與在其之外的認同之間，而正是因爲敵對對於此一「外部」的需要，導致拉克勞宣稱「沒有異質性，也就沒有敵對」（Laclau, 2005: 149）。易言之，若欲在資本家與工人所共同打造的再現空間中建立敵對關係，就必須仰賴外部異質性元素，沒有這些異質性元素，便無政治接合的可能。就上述的例子而言，拉克勞認爲政治接合的前提，便是在於以「活生生的工人」取代「概念上的工人」。而這個活生生的工人，代表的便是「概念上的工人」所無法化約的異質性。拉克勞可說是相當程度地呼應了 Bataille 的觀點。在一篇討論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中，Bataille 指出，

---

[30] José Nun 是一位阿根廷的政治經濟學家。在拉克勞所引用的這篇文章中，Nun 強調傳統馬克思主義詮釋工業後備軍或是失業人口，往往將之視爲資本家降低工資獲得更多剩餘價值的手段。也因此，雖然形式上失業人口是在生產關係的外部，但是實質上對於系統內部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然而 Nun 的關注在於，倘若失業人口的數量超過實際上調節工資的需要時，那麼便無法持續成爲系統內部使系統可以運作的功能了（Laclau, 2005: 146-147；Nun,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作爲一個生產者，工人落入了社會組織的框架中，但是該規則的同質性化約，僅僅影響到他們賺取薪資的活動而已。他們是在工作行爲上，而非作爲人的意義上，被整合進一種心理同質性。在工廠之外，甚至在其技術操作之外，一個勞工相對於一個同質性的人（老闆，官僚等等），是一個陌生人，一個不同性質、不能化約、非臣屬性的人（1997：123）。[31]

Bataille 認爲異質性所關注的是無法被同化的元素。異質元素是無法被充分觀察的元素，是一種破壞顛覆同質秩序的震撼力量、剩餘與瘋狂（1997：126-128）。拉克勞宣稱他與 Bataille 對於同質性的理解基本上並無二致，也就是說，同質性是在異質性的基礎上，透過接合的方式，建立規則，試圖在原本缺乏形式、不具組織的元素之間產生一種僵化的關聯方式。[32]

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來釐清拉克勞所談的異質性：首先，它指的是無法透過辯證方式回歸、抗拒象徵意義化的外部；其次，它是等同關係中個別訴求暫時被擱置但是不會完全消失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最後，特殊性是造成某些訴求無法被整合收編進入等同關係的障礙（2005：152）。而異質性的多重面向說明了歷史總是無法避免被外部的異質性穿透而失去穩定性。然而，拉克勞提醒我們，外部也同樣地會受到內部的影響。敵對疆界浮動的可能性，所仰賴的便是外部與內部之間的相互穿透。倘若兩者各自佔據固守一片既定的領域，那麼，疆界便無法產生變動，也不可能有持續的政治行動的可能（2005：153）。[33] 我們可以以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

---

[31] 其實，如果我們接受 Antonio Negri 與 Michael Hardt 對於帝國中的控制社會，以及 Paolo Virno 對於後福特主義的觀察，那麼，我們可以對此一觀點提出質疑。在當代後福特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同質性已經被異質性所取代，規訓也被彈性調節取而代之。當代生命政治的運作所依賴的不是固著的機制，而反而是彈性以及不斷更新的創造力。

[32] 而正是由於社會異質性，政治接合也就不限於工人對抗資本家的敵對關係。如同從《霸權》一開始，拉克勞與慕芙便致力於破除任何本質主義神話，挑戰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一定得是工人的預設。換句話說，對抗資本主義的主體位置，只能透過多元敵對多重決定的方式產生（Laclau, 2005: 150），我們無法先驗地設定鬥爭的主角，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系統之外會存在著一些人……——而這些人便是我們所稱的異質性——他們對於建立敵對疆界而言極為關鍵」（ibid.）。

[33] 至此，拉克勞針對民粹主義（事實上也就是他所認知的政治的一般邏輯）下了一個初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

去年（二〇〇五年）八月在高雄發生了泰國勞工集體抗爭事件。如果我們觀察整個事件的演變過程，將不難發現，事件的焦點從原先泰勞抗議自身惡劣的勞動與生活條件，希望社會各界關注不合理的移工政策，轉變爲節節升高的弊案揭發連續劇。此一轉變一方面使得因該事件而被偵訊的十八名泰勞[34] 以及在台移工的處境與相關政策改革未能持續獲得媒體的青睞與社會大眾的關注，另一方面則讓我們再度見證了藍綠陣營的二元對立以及一個變本加厲的媒體社會。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解嚴以來的台灣政治地景浮現了各式各樣的對立。其中「台灣 vs. 中國」、「本土 vs. 外來」、「獨派 vs. 統派」、「泛綠 vs. 泛藍」等強勢收編各種社會訴求，進而將政治空間切割成二元對立陣營的政治動員，往往被歸類爲「政治惡鬥」而招致以下的批評：二元對立的政治邏輯只會極盡其能事地收編不同的訴求，以獲取最大多數的支持。而其收編不同訴求的方式，可以是將之納入自己的陣營成爲同志，亦可以是將之編派成爲敵對陣營的一員。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整個社會似乎難以倖免地陷入非友即敵的深淵中。對於這樣的化約操作，許多人引以爲憂，認爲已經嚴重戕害民主政治的發展，擠壓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不過，即便被視爲具有強大收編力量的二元對立政治動員，亦非漫無限制地吸納收編所有的訴求，而其限制，如果我們接受了拉克勞的觀點，可以大致說明如下：

首先，透過對於異質性的強調與理解，我們知道目前的二元對立並不是一種必然的發展，且等同關係中的兩造各自接合的環節之間的差異並未全然消失，因此，我們仍舊可以看到原先的同志後來夜奔敵營，或者產生各種的合縱連橫的組合。易言之，即便是藍綠陣營的對峙，其中的疆界亦具有浮動的空間。其次，也許某些訴求浮現之初，無法透過某個特定的敵對關係再現，而因此成爲被排除者，但是此種排除，一如我們先前的討論

的結論，亦即民粹主義中「人民」（或其他政治運動的廣泛訴求）的建構涉及的是一個透過空符徵再現的等同關係、流動符徵所造成的疆界的不穩定性，以及使得接合實踐可能的異質性（2005：153-156）。關於拉克勞對於民粹主義的探討，請參閱林淑芬（2005）。

[34] 在 2005 年 11 月底四名泰勞被依加重竊盜、縱火、妨害公務罪嫌起訴（聯合晚報，2005/12/4：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指出，並未涉及敵對關係，而僅只是一種冷漠的排除。這些被排除者，卻不見得會永遠地被排除。透過不同的社會運動團體（例如，婦運、工運、環保，以及人權團體）[35] 與個人，或者刻意與上述政治動員所強調的敵對保持距離，或者藉由接合、暴露新的社會問題，挑戰前述的二元對立，或甚至建立新的對立關係與之競爭。換句話說，不具主導地位的社會運動並非不操作敵對邏輯，而是其所操作的敵對無法或不欲像前述的政治動員一般，收編各式各樣不同訴求，並將政治空間化約成兩個敵對的陣營，是一種比較有節制的等同鏈的建立。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社運團體在特定的議題與訴求上相互支援，但是這種支援可能只是暫時性的結盟，在運動訴求達成或者失敗之後，便解除結盟關係，回到原先各自的議題領域上耕耘。也有些無法獲得廣泛支持聲援，自始至終都得單打獨鬥的議題或訴求。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即便社會運動團體可能另闢戰場而與主流的二元對立論述產生競爭甚至敵對的關係，卻也無法完全排除被兩個陣營的其中一者收編，或者成爲兩造競相爭取合作的對象的可能性，因此進入了既有的再現空間之中。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這樣的例子所在多是，而在泰勞抗議的事件中，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敵對的多向操作，以及異質性所扮演的角色。泰勞的抗爭，一開始，也許真如 Bataille 所言的，作爲一種震撼的力量，以及全然被排除在主流藍綠對立之外的訴求，可以暫時性地打斷既有秩序，而呈現其異質性的面向。但是，對於此一異質性，可以有幾種後續的發展，首先，我們看到泰勞的訴求進入另外一條等同鏈中，亦即另一個敵對關係中（例如許多團體與個人對泰勞的聲援，以及進一步提出的訴求與建立的敵對關係）。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原本敵對陣營中的一方，試圖將之轉化成對其對手的打擊，使得泰勞抗爭事件，在這個收編轉化的過程中，轉變成在野陣營對於執政陣營清廉的質疑，而泰勞的訴求在藍綠陣營中仍然乏人問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除了可以說泰勞抗爭事件被收編了之外，也可以說它回復到藍綠對立之外的異質性狀態，重點當然在於泰勞訴求的特殊性被解消在藍綠對峙的等同關係中，且作爲流

[35] 關於人權運動對於台灣民主想像的衝擊與重構，請參閱 Lin (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符徵而進入的其他再現關係尚不足與藍綠對峙一別苗頭，當然，原則上，這並不意味著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只是其可能性空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伍、結　論

現在，讓我們回到文章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所有的鬥爭都得採取聯合鬥爭的形式，個個擊破式的鬥爭是否不可行、聯合鬥爭是否一定得以霸權邏輯接合，並建立起一個代表/再現的關係，以及，是否會因此化約了差異？依循著我們從拉克勞早先對於「離散中的規律」的解讀以及晚近對於異質性的定位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對拉克勞而言，以上問題的答案皆是肯定的。

首先，在我們接續地討論了元素／環節，流動符徵／空符徵，疆界／界限，等同邏輯／差異邏輯，規律／離散，敵對／錯位，乃至最近的同質性／異質性等區分之後，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拉克勞修正了早先對於所有認同都是建立在敵對關係上的宣稱，而把敵對相對化爲面對錯位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的方式。我們也因此可以推論論述形構的「離散中的規律」，不必然涉及敵對，敵對只是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這種特定可能性被拉克勞稱之爲「政治」。[36] 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認同都是「政治性」的認同，然而凡屬政治性的認同，則必然涉及敵對。職是之故，即便拉克勞同意並非所有的認同都是敵對性認同，但是就其將霸權理論設定爲一種政治的存有論來看，我們似乎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對拉克勞而言，敵對仍是不可或缺的面向，而霸權接合也是政治行動的必經之路。[37] 是以，針

---

[36] 慕芙在《回歸政治》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所有的認同都是關係性的，必須透過指認差異或作爲「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的「他者」始能成立。就集體認同而言，「我們」的存在可能性條件便是與「他們」之間疆界的劃定。不過，重要的是，此一區分隨時都有可能轉化成敵／我區分，亦即成爲 Carl Schmitt 式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區分（1993：2-3）。慕芙的說法說明了並非所有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都必然涉及敵對，唯有當「他們」不被視爲中性的（indifferent）被排除者或差異，而是被視爲對「我們」的否定與威脅時，區分才開使「敵對化」（ibid.）。

[37] 即便拉克勞的伙伴慕芙這幾年來致力於提出將敵對轉化成爭鬥（agonism），避免敵友邏輯造成的摧毀，但是基本上，慕芙也強調，對政治而言，敵對的面向是永遠不會消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論者所稱霸權理論的核心已從敵對轉移到異質性上的說法，本文抱持著比較保留的態度。我們只能說，相對於早期未針對離散進行較爲深入的討論，且混淆了界限與疆界以及錯位和敵對的差異，晚近的作品提出的異質性概念，的確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論化霸權邏輯運作的排除性、偶然性、開放性以及不可能完滿的特性，稍微改變了理論不對稱地專注於整體的情況。不過，這仍不意味著其早期作品不關注上述特質，[38] 因爲基本上，異質性概念與其早期作品的立場並沒有本質上不同，而僅只是理論化程度的差異罷了。

以此觀察爲基礎，筆者的第二個論點便是，異質性其實只是錯位的另一個說法，而非如拉克勞所稱之全然外在於敵對與錯位建構起來的連續再現空間的不可再現者。在拉克勞認真地將錯位與敵對區分開來，並以錯位指稱所有認同形成所需的再現／自我指涉機制的「界限」（亦即其不完滿）之後，基本上已經無法將錯位全然地置於再現空間的內部（如前述，拉克勞認爲錯位與認同是接續的再現機制），而是一個既（非）內又（非）外的界限，是一個弔詭的所在。倘若如此，錯位與敵對其實並非如拉克勞所言一個連續的再現機制。再現與敵對仍只是一種偶然的關係（因爲並非所有的錯位都需以敵對來面對）。尤有甚者，「錯位」與「異質性」在概念上其實無法清楚區分。如果異質性指的是再現系統的外部，無法透過辯證的方式回歸到系統之內，那麼其與錯位的意義便會重疊。也就是說，異質性並未超越「錯位」所表示的內涵，亦即，結構內在的不完滿，或任何再現空間都伴隨著不可再現的元素。

的，且唯有在此一認知的前提下，才可能破除以和解之名行壓迫之實的假象，也才有實現自由平等的可能。

38 事實上，正因爲拉克勞與慕芙自始至終不斷地強調霸權的偶然以及不可能完滿的特性，以及再現過程所涉及的無法全然超克的弔詭，因此，在經驗研究上，除了分析在特定歷史情境中之特定敵對關係所造成的二元對立陣營的相互排除之外，原本就無可避免地會觸及在該敵對關係之外的諸多訴求。筆者關於台灣從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民主化」過程，便是秉持著這個原則，指出在前仆後繼的二元對立論述之外，總是有剩餘物，無法被特定的二元對立訴求所再現，不論是本土化論述，或者某種異性戀中心的女性主義論述皆然，可參閱 Lin (2000, 2003)。因此，本文也不全然同意 Thomassen (2005) 的說法，認爲至此受霸權論述理論影響的經驗研究才得以將焦點轉移到異質性上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必須要強調的是，或許拉克勞已經跨出了一大步，承認雖然所有的認同都是錯位的認同，不過並非所有的認同都是敵對的認同。但是，最關鍵的問題仍舊在於霸權理論對於意義以及認同的預設，以及對於建構整體的必要性的堅持，也因此阻絕了讓異質性或離散以「獨一性」（singularity）而非可能被收編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出現的可能。不論是離散或異質性，都是從系統／再現的不完滿的角度而被認知（不論是沒有歷史的人，流氓無產階級，或者邊緣群眾），皆無法在特定的再現關係之外被指涉。我們可以說這便是拉克勞與慕芙的政治存有論立場。也難怪至今拉克勞與慕芙對於受到史賓諾莎（Spinoza）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啓發的「眾生」（multitudes）思想的批評仍是不遺餘力的，而其中最主要的論點便是指出「眾生」不是政治主體，因爲政治主體必然涉及接合與敵對的建立，以及再現機制（Laclau, 2004b；Mouffe, 2005）。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基進民主政治的核心關注是如何可以找出共同敵人（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不同的訴求之間建立等同關係，以全力反撲。是以，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不同的差異之間找到一個共通的語言。而本文中所闡述離散中的規律，等同／差異邏輯、劃疆界，空符徵，以及對於偶然性與不完滿的強調等等，便是他們所提出的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與策略。不同於此，對於 Hardt 與 Negri 等理論家而言，傳統的抵抗理論錯置了問題。當前帝國中的眾生不需要翻譯，也不必透過接合，每一個節點都可以是權力的作用點，每一個節點同時是集體與個體的交會所在，因此不需要橫向的連結，當其奮力躍然而起，便可直擊帝國。顯然地，這是兩套不同的政治觀，兩種不同的存有論，兩者之間的扞格，主要在於面對差異所採取的不同方式。在本文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到在拉克勞的霸權理論不可能在純粹差異（或異質性）的基礎上想像政治，雖然差異的確是其基進民主中不可化約的面向，也是基進民主持續推進的動力。但是，這和不從整體的角度來認知差異，並以差異本身作爲起點想像政治是相當不同的，而這個複雜的問題需要留待將來另文討論。[39]

[39] Deleuze, Guattari, Antonio Negri 以及其共同的理論源頭史賓諾莎哲學，都將是此一差異政治的思考資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林淑芬，2003a，〈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29-72 。

林淑芬，2003b，〈自我之外，猶待發明的政治〉，「傅柯思想研討會」論文（12 月 28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林淑芬，2004，〈傅柯論權力關係與主體〉，《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6 (1)：117-150。

林淑芬，2005，〈人民作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2 ：141-182。

聯合晚報，2005/12/04，第 11 版。

二、英文部分

Bataille, G. 1997.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In *The Bataille Reader*, eds. F. Botting and S.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122-146.

Butler, J., E. Laclau, S. Žižek S.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London: Verso.

Critchley, S. 2004. “Is there a Normative Deficiency in the Theory of Hegemony.” In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eds. S. Critchley and O. Marchart. London: Routledge, 113-122.

Dallmayr, F. 2004. “Laclau and Hegemony: Some (post) Hegelian caveats.” In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eds. S. Critchley and O. Marchart. London: Routledge, 35-53.

Dreyfus, H. and P. Rabinow.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Evans, D. 1996.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M. Sherid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mith.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 Michael J. Shapiro.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08-138.

Han, B. 2002.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 Edward Pi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Laclau, E. 1996a. “Universalism, Particular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n *Emancipation(s)*, by Ernesto Laclau. London: Verso, 20-35.

Laclau, E. 1996b.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In *Emancipation(s)*, by Ernesto Laclau. London: Verso, 36-46.

Laclau, E. 1996c. “Subject of Politics, Politics of Subject.” In *Emancipation(s)*, by Ernesto Laclau. London: Verso, 47-65.

Laclau, E. 2000. “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In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by J. Butler, E. Laclau and S. Žižek. London: Verso, 281-307.

Laclau, E. 2004a. “Glimpsing the Future.” In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eds. S. Critchley and O. Marchart. London: Routledge, 279-328.

Laclau, E. 2004b. “Can Immanence Explain Social Struggles?” In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eds. P. A. Passavant and Jodi Dean. London: Routledge, 21-30.

Laclau, E.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Laclau, E., and C.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efort, C. 1986.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Ed. and intro.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in, S. F. 2000.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mid-1980s ~ mid-1990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visited - In Pursuit of a Radical Democracy.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Essex.

Lin, S. F. 2003.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nd Human Right Movement as a Critique." In *Contextualiz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Problems of Power and Democracy*, eds. Anders Uhlin and Nicola Piper. London: Routledge, 168-188.

Mouffe, C 1993.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Mouffe, C.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Mouffe, C. 2005. "Exodus und Stellungskrieg: Die Zukunft radikaler Politik." Manuscript.

Norval, A.J. 2000. "Future Research in Discourse Theory." In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eds. D. Howarth, A.J. Norval, and Y. Stavrakaki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19-236.

Norval, A. J. 2004. "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9(2): 139-157.

Nun, Jóse, 2000. "The End of Work and the 'Marginal Mass' Thesi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7(1) January: 6-32.

Stäheli, U. 2004. "Competing Figures of the Limit: Dispersion, Transgression, Antagonism and Indifference." In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eds. S. Critchley and O. Marchart. London: Routledge, 226-240.

Stallybrass, P. 1990. "Marx and Heterogeneity: Think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Representations* 31: 69-95.

Stambaugh, J. 1969 "Introduction."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by Martin Heidegger. Trans., Joan Stambaug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18.

Tønder, L. and L. Thomassen. 2005. *Radical Democracy: Politics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homassen, L. 2005. "From Antagonism to Heterogeneity: Discour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alytical Strategies." *Essex Papers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Sub-Series In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no. 21.

Widder, N. 2000. "What's Lacking in the Lack: a Comment on the Virtual." *Angelaki* 5(3): 117-138.

Widder, N. 2003. "Foucault and Power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PSA, UK.

Widder, N. 2005. "Two Routes from Hegel." In *Radical Democracy: Politics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eds. Tønder and Thomasse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2-49.

Žižek. S. 1990. "Beyond Discourse-Analysis" appendix to E.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249-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agonism and Heterogeneity in Ernesto Laclau's Hegemony Theory

*Shu-fen Lin**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dispersion / heterogeneity is not thoroughly discussed in Laclau and Mouffe's earlier work on hegemony, it does indee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 would contend that hegemony theory is, from the outset, constructed in the particular way in which dispersion/heterogeneity is theoriz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at although Laclau and Mouffe have constantly emphasized the ultimate impossibility of closure, their insistence on the necessity of antagonism and hegemonic formation has generated a seemingly inevitable effect: that dispersion / heterogeneity can only be percei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 system and deemed as its lack or deficienc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otion of 'regularity of dispersion'. This will then be followed by an explication of categories of 'antagonism' and 'dislocation'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Laclau's understanding of dispersion / heterogeneity.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reformulation of the category of heterogeneity in Laclau's latest work, and will provide a 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its theoretical as well a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Keywords: antagonism, hegemony, dislocation, heterogene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fen@s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